

阅读,成为更好的自己

文/王雪岩

我喜欢阅读,阅读充满了我的生活。一日不读,如隔三秋,不是阅读选择了我,而是我离不开阅读。



赵雪峰 画

我是一名老师,当我在教育教学中遇到问题,那些读过的书就会为我出谋划策,帮我找到解决办法。《给教师的建议》《第56号教室的奇迹》《中国著名班主任德育思想录》《班主任工作漫谈》《优秀是教出来的》《教育智慧从哪里来——点评100个教育案例》《教师不可不知的心理学》等书都是法宝,是不开口的老师,是锦囊团。

其实,在学校里,往往琐事更多一些,学科知识按教材教就行,问题大多出在班级管理上。班级管理是一门永无止境的学科,学习方式有很多,最便捷的就是阅读,多看班级管理的案例,了然于心,遇到同类事情就迎刃而解了。教育学首先是关系学,有了好的关系,才能有好的教育。师生间互相启发,携手进步,既有为师者的示范与担当,也有学生渴求真理、感恩师恩的追求与情义,把握好这种关系,老师和学生共同成长,都在受益。

我还是一名校刊编辑,辅导孩子们阅读与写作。我认为,文本解读是阅读的基础,是阅读的逻辑出发点,教师缺乏文本解读功夫,搞不好阅读教学,也没法指导学生写作。我把阅读得来的好东西,化成指导孩子们写作的方法和技巧。孩子们读名著,查资料,和作文点评老师交流,学经验,找不足,购买有关写作的书籍,思考怎样才能写出好故事。他们看毕飞宇的小说,张莉的评论,刘慈欣的科幻,杰夫·格尔克的《情节与人物》,詹姆斯·斯科特·贝尔的《冲突与悬念》,罗纳德·B·托比亚斯的《经典情节20种》……在我的悉心指导下,2023年4月,在第十届校园文学年会暨文学教育成果展评交流会上,我校的“小草文学社”从参评的300多个文学社团中脱颖而出,荣获全国“百佳校园文学社团”称号,我被评为“百佳校园文学社团指导教师”,并全票当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第三届理事理事。

阅读的同时,我还不忘记资料,分门别类,建文档,做卡片,记笔记,转发、收藏、点赞等,都是我的阅读轨迹。阅读指导我做很多事,生活小窍门、妙招妙法、黑科技,找适合自己的用,跟写材料作文一样。当你能讲故事,会看电影,懂得演技,能看懂图片,万事万物都能从阅读运用到写作上,素材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,那写文章

对你来说就不会是一件难事。我就写过一个“好系列”:《歌词里藏着好文章》《活动里藏着好文章》《照片里藏着好文章》《演技里藏着好文章》《跨年演讲里藏着好文章》《报刊里藏着好文章》……这些文章发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官方网站和“写作密码”公众号上,都下双黄蛋。这都是我攒资料的结果。我读到的每一处文字都是资料,都会储备在我的资料库里,用时调出来。阅读给我灵感,让我有冲动坐下来写文章,当阅读成为习惯,读来的好东西被消化吸收,就“下笔如有神”了。

我是个惜时如金的人,唯有花在阅读上的时间不心疼。我的阅读是有效率的,就找能给我提供营养的书去读,不去啃什么“大部头”。这就跟吃肉似的,牙口不好,找软的烂糊的吃,牙口好再去啃硬骨头,因时间有限,吃一口得一口,实在吃不着,喝口肉汤也是在增加营养。我尝试着把深奥的道理用最通俗的语言讲给孩子们听,使他们瞬间就明白;我让孩子们讲述一本书的自问,不用书本上的内容提要,换成自己的话说,最后用一句话概括;我带领他们练习扩句、缩句、扩段、缩段,经过此番拾掇,一篇好文章就诞生了。我教给孩子们最行之有效的检查作文的方法就是大声读出来,只要一读,哪里有毛病立马显现,让人感到不舒服,改完就舒服了。

回想这些年,是阅读成全了我,带我到达一个更高的理想境界。每天我都会扪心自问,今天有没有认真读点东西,写点什么,如果没有,我会难过,会反思,会找补。毕竟,每一天都不虚度才让人踏实。不是一个人静下心来去阅读,而是阅读让人静下心来。阅读使人思维活跃,精神饱满,眼界高远,胸襟开阔;不读,就容易逐渐沦为精神和思想上的病夫。

现在,阅读的方式多种多样,音频、视频、日更,参与在线课程、网络讲座、有声图书馆,都是在读书。知人论世、读无字之书也是一种阅读。诚如叶倾城所说,阅读对我们来说,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一条船,不管你自己的世界是多么狭小或者平庸乏味,你总可以通过阅读到达另一个星系,另一个未来。你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在书中看到,你所有的喜悦也有人分享。也如阿兰·德波顿所说,假如我们整晚与书相伴,那只有一个原因,我们喜欢。

老汪说宋瓷

用夜色打底制作茶盏,取倒置的斗笠为形,然后在盏芯里用一片秋叶覆盖,待烧成时用釉水把秋叶的图案尤其是筋脉固定下来,这种秋叶纹玄色斗笠盏,曾经在南宋京城临安风靡一时,成为当时的经典茶具。

秋叶纹斗笠盏就是吉州窑的独创,在中国陶瓷史上享有盛名。

在古陶瓷界,素有“南青北白”之说。南方喜欢青瓷,北方崇尚白瓷,尤以隋唐五代时期为甚。吉州窑的黑色器物,能够在南宋时脱颖而出,究其原因,我觉得,它就像一股从田野吹向都城的新鲜之风,让曾经在江浙沪颠沛流离的宋高宗,在宫廷高墙里呼吸到大自然的气息,暂且平息了他思念故都、故国之苦。

在杭州老城工地,但凡有井水处,有河道处,有官府处,都会有吉州窑残器或瓷片出土,又以望江门工地和密渡桥工地这两个区域出得最多。

有个湖北襄阳的朋友张宗林,他在杭州捡瓷片,又边买边卖瓷片,他卖瓷片是全国到处跑。他对我讲过卖瓷片中的一些有趣的事,有件事让我有点吃惊。

早些年,他在景德镇卖瓷片时,遇到江西南昌和吉安、赣州等地的朋友,他们说他们卖的吉州窑瓷片是假的。张宗林说,这是他在杭州工地亲手捡的,根本不可能是假的。

对方有人拿出瓷片,说这才是正儿八经吉州窑的。张宗林一看,这瓷片果真与杭州出的不一样,受土沁有点厉害,皮壳发干,上面的一条条黄线纵横交错,有黄土沁进缝隙里,怎么洗也洗不干净。

张宗林无法解释。后来,他把这件事说给同在杭州捡瓷片的江西伙伴听。江西伙伴说,他们一开始在杭州捡瓷片也遇到过这样的疑问,捡的时间长了,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解决了。

原因在于,江西多是红土地,江西出的吉州窑瓷片也多是山上所出,而杭州的吉州窑瓷片出自老城墙工地,地下水位高,瓷片就像浸泡在湿润的泥沙当中,历经七百年之后,仍然光亮如新,更添了几分酥油感,让人爱不释手。

与南宋官窑追求素净、典雅、尚青的风格完全不同,吉州窑着色大胆,敢于浓墨重彩,以黑色为底,在上面可以辅以金黄、红褐,甚至七彩。

杭州老城近四十年所出的吉州窑瓷片,流向虽广,却也有相对集中的几个地方。看朋友圈,目前,杭州、宁波、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地大致形成了玩吉州窑的圈子。

上海朋友刘龙翔对吉州窑的认知,常常让我很受启发。他认为,吉州窑的器物在纹饰上敢走极端,它走的不是一个极端,而是两个极端,左边的极端敢走,右边的极端也敢走。纹饰敢求简,敢求繁,敢求意。简,简到光素无纹。繁,繁到密不透风。意,意到天上人间。简者,如吉州玄色盏,通体一色,不事雕琢。繁者,如吉州豹纹梅瓶,通体都用豹子斑装饰,很有冲击力。意者,如月映梅盏,图案中,天上一弯新月,地上几枝红梅,便觉春天不远。

吉州盏的名品除了上面提到的秋叶纹斗笠盏之外,还有一款“不倒翁”茶盏也让崇尚宋器的茶人念念不忘。

我在杭州捡瓷片的朋友小肖手中,曾见到一只密渡桥工地所出的“不倒翁”,这只茶盏只是口沿有个蚕豆大的小磕,别处还好。在桌面上把这只茶盏放倒,用食指在口沿处轻轻给点力,盏就立起来了。双手把盏捧起,挺压手的。

个中原因很简单,这只盏的底座做得特别厚实,盏壁也从底部到口沿慢慢由厚变薄。它的重量大部分都集中在底部。

这看似简单的秘密,却是陶瓷史上的一项颠覆性变革。对窑匠来说,这个秘密不是大家不知道,而是知道却不能为。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柴窑当中,窑火上行,如果器物的底部做得过厚,就不容易烧透,要么烧裂,要么烧得起泡,成功率非常低。

吉州窑逆规律而行,并走向成功,那付出的一定是上千次的努力。

自古民以食为天,但“吃”早已不是简单的温饱手段,更是一种刚需的社交方式。或亲朋相聚,或好友婚庆,或同事乔迁,一顿顿吃席总是免不了的,真是办席聚人气,赴宴撑场面,席间共追忆,举杯交新朋。当然席间也有“真干饭人”,以及只为随份子而来的“讲究人儿”。

而一谈起吃席的故事,大家脑海里可能瞬间浮现无数名场面,毕竟安安静静吃顿饭不过是“家常便饭”,“嬉笑怒骂”才能记忆犹新。比如《亮剑》里李云龙“借花献佛”,带着魏和尚,约上晋绥军三五八团团团长楚云飞,一起大闹龟田一郎生日宴;又如春晚赵本山、范伟所演绎的经典小品《牛大叔“提干”》里,牛大叔提溜一串老鳖蛋,戏说“扯淡,扯淡,就是在这儿来的”的场景;再如一度流行网络的那首云南童谣《毒蘑菇之歌》,“红伞伞,白杆杆,吃完一起躺板板;躺板板,睡棺棺,然后一起埋山山;埋山山,哭喊喊,亲朋都来吃饭饭”。

当然,在我们交流吃席名场面和席间故事时,可能未曾留意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,为什么叫“吃席”?咱吃的不是“饭”嘛?而且不论是否“坐小孩那桌”,不都是上桌吃饭吗?进而还会追问,“吃席”这一提法是何缘故呢?

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着100多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苇席,大者超过一平方米,距今已有六千年之久。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,苇席的作用就是铺床纳凉,可在新石器时代,现代意义的“床”还没出现。所谓幕天席地,据专家推测,这些苇席应该是用来盖屋顶与铺屋地,而古人的吃住、祭祀、娱乐,也就都从这一张席子展开。

西周时期,礼制成为重要的社会法则,礼更是寓于诸物的使用过程中。席子的“排面儿”也有别以往,用席成为一件“讲究事儿”,数量、大小、纹饰、陈设位置都显示着身份等级,昭示着社会地位。《礼记》里称,“天子之席五重,诸侯三重,大夫再重”。可见不同等级不仅用席层数有所不同,每层席的纹饰也各有差异,以天子之席为例,最下层的席子是用莞草编制而成的“莞席”,质地粗糙;再上一层是“藻席”(又称“纛席”),以五彩丝线夹于蒲草,使整个席都带有五色花纹;又上一层是“次席”,桃竹枝编成的竹席;覆上一层是“蒲席”,即以池泽水草编制而成,精美非常;最上一层称为“熊席”,当然也不限于熊皮,可能采用虎、豹等猛兽之皮毛制成。

当然,众人共处一室落座,席子的讲究就更为繁复了。首先,席子的摆放位置决定尊位不同。相信大家熟悉《鸿门宴》里的座次片段,“项王、项伯东向坐,亚父南向坐……沛公北向坐,张良西向侍”,实际上,尊位是与席子摆放密切相关的。据《礼记》所说,“席南向北向,以西方为上;东向西向,以南为上”,而这种尊位讲究在今天的宴席之上也有所延续。其次,席子铺得高矮也彰显着身份,一人独坐的要高于二人席,二人并坐的又要高于三四人席。最后,为了保障座席的礼制不被打乱,西周还专门设置了“司几筵”一职,负责管理“席子问题”,《周礼·春官》里讲“司几筵掌五几、五席之名物,辨其须知与其位”。

周以降,筵席制度发展逐渐完备,“筵席”与“吃席”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。所谓“设席之法,先设者皆言筵,后加者为席”,“筵”为铺在底下的长席,而“席”则置于“筵”上,依人数而设。而不仅“民以食为天”,官也有“两张口”,诸公落座不可能只谈政事,也要穿衣吃饭,《礼记·礼运》更是点明了“夫礼之初,始诸饮食”,“坐席”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“吃席”。而随着隋唐之际(也有学者认为是汉代)桌子的出现,宴饮也就“上得了(桌)台面”,叫法更是产生变异,如潮汕人办席就称为“办桌”,吃席自然也称为“食桌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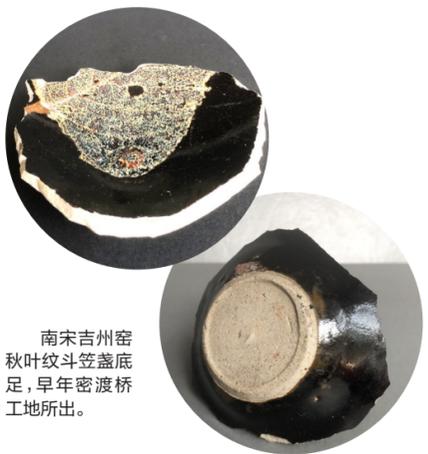
“吃席”这类古语的沿用并非个别现象。我国历史悠久,各地文化博大精深,而这些古语就活在很多地区人民的口耳之间,即各地的方言之中。这一文化现象,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具有绵延千载而不绝的强大生命力。

(摘编自《国家人文历史》)

请客吃饭为何叫「吃席」

吉州吹向京城临安的风

文/汪少一



南宋吉州窑秋叶纹斗笠盏底座,早年密渡桥工地所出。